

古代官德的价值取向

朱熹认为《大学》中“三纲领”和“八条目”就是教授贵族子弟及士人们如何做人 and 做官，做人是“内圣”的功夫，做官是做人的“外王”实践。

《大学》中的“三纲领”体现了中国古代官德的价值取向，具体表现为：

明明德。《大学》开篇就讲“明明德”，其意在强调治理天下国家，必须以道德修身为前提。一是德先于位。《大学》讲：“君子先慎乎德，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。”二是以德帅才。我们党历来把德才兼备视为选拔干部的主要标准，特别是把道德素质放到至关重要的位置，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做官必须先做人，而人性的本质就在于人的德性。

亲民。以《大学》“亲民”理论为核心，可将中国历代官民关系理论概括为三种：一是民贵君轻。孟子提出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。二是先民后官。“王天下者，必先诸民，然后庇焉，则能常利。”三是民心向背。儒家从根本上强调国家一切权力归于君王，但也高度重视民心向背对政权的重大作用，“得天下有道，得其民，斯得天下矣”。今天的共产党人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没有任何私利，但掌握公共权力的党是由不同利益需求的个人和部门组成的，对个人和部门利益的追求必然会使某些人背离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，一旦权力阶层和资本阶层结盟形成官僚资本，开始压榨和剥夺劳动阶层的利益，就必然对我们党构成巨大的生存威胁。因此，如何牢固树立我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，将是我党未来所面临的重大挑战。

止于至善。《大学》讲“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”。又说：“为人君止于仁，为人臣止于敬，为人子止于孝，为人父止于慈，与国人交止于信。”笔者认为，“止于至善”是在综合了“明明德”和“亲民”这两个环节之后，在更高层面上所实现的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。它包括两层含义：一是为官从政要有明确的人生目标，只有立长志，才能定、静、安、虑、得。二是儒家追求的至善，还包括君臣父子百姓之间的仁、敬、孝、慈、信。为官从政只有真正做到了孔子所说的“修己以安人”，才算达到了“止于至善”。

古代官德的实现途径

如果说《大学》的“三纲领”代表了儒家政治伦理的根本宗旨和价值取向，那么“八条目”就是教育为官从政者通过何种途径实现上述价值追求。

“格物致知”“诚意正心”属于“内圣”的范畴，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属于“外王”的范畴，“修身”是全部内容的核心和实现“内圣外王”的中轴。

关于“格物致知”。朱熹解释为：“所谓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穷其理也。盖人心之灵，莫不有知，而天下之物，莫不有理，惟于理有未穷，故其知有不尽也。是以《大学》始教，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，以求至乎其极。至于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贯通焉，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，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。”朱熹上述诠释的核心是“为政必先学”，因为从政是一门特殊的职业，古代士人出仕做官，必须先要学习为政之道。一方面，执政者只有具备应有的领导素质，才能去教育引导他人。另一方面，只有通过刻苦学习才能掌握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，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。

关于“诚意正心”。《大学》指出：“小人闲居为不善，无所不至；见君子而后厌然，掩其不善，而著其善。人之视己，如见其肺肝然，则何益矣？此谓诚于中，形于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”可见，诚意所强调的重心是反对“伪善”和力主“慎独”。就“伪善”而言，各级官员之所以出现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现象，根本原因是官员内心深处存在着双重人格，没有严格解剖自己的决心和勇气，无法同自身的弱点作斗争，无法实现人格的自我同一。就“慎独”而言，它作为一种道德修养方法，关注的重心是在没有外在监督的情况下，仍然坚持自己的道德信念，自觉按道德要求行事。

《大学》里还提出了“絜矩之道”的概念，其中阐释道：所恶于上，毋以使下，所恶于下，毋以事上；所恶于前，毋以先后；所恶于后，毋以从前；所恶于右，毋以交于左；所恶于左，毋以交于右；此之谓絜矩之道。这里列举的六个维度共同构成了君子从政的环境空间，其所涉及的实质问题是君臣关系问题。儒家对待君臣关系的基本态度是《论语》中所讲的：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”，在儒家看来，君臣关系不仅是君王对臣子单方面的要求，而是双方共同的责任义务。